

# 论宋代理学家的词及理学对宋词的影响

西北大学文学院 张文利

**内容提要** 宋代理学家的词创作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大略可分为具有理学意味的词作和词人面貌的词篇两类。但按照一个文学流派的形成必须具备的流派宗主、文人群体和主导风格三个要素来衡量,宋代并不存在所谓的理学词派。理学和宋词的关系,不仅体现为理学家对词创作的染指,更有理学对词的深层次影响。在词学观念上,理学的浸染,使得文人学者对词的品评,出现道学气;在词的创作上,以理入词,扩大了词体的表现畛域,强化了宋词的哲理色彩,促进了宋词的雅化。

**关键词** 宋词 理学 以理入词 宋词流派

两宋是词的盛世,流风所及,遍于朝野。宋代又是理学发生、发展、兴盛的时代,讲求存理灭欲的理学家与以温婉侧艳为基本特征的词之间关系如何?学者们的相关著述中高义纷呈,但混乱与歧见并存,仍有进一步梳理和厘清的必要。本文以宏观考察为旨要,以微观分析为津梁,探讨宋代理学家的词创作情形以及理学对宋词的影响和渗透。

## 一、宋代理学家词的两种面貌

宋代理学家存世的词作数量不算多,据学者统计约七百余首。<sup>①</sup>考察两宋时期理学家的词创作情形,大约可分两路观之:

一类是具有理学意味的词作,即以理入词。理学家以理入词的情形包括以理语入词、以理意融词、以理法构词。

以理语入词,即将理学的概念和范畴引入词中。如:“气脉中庸大学,体统采薇天保。”(洪咨夔《水调歌头·送曹侍郎归永嘉》)“流水行云才思,光风霁月精神。”(洪咨夔《朝中措·寿章君举》)“物象芸芸,知几许、功夫来格。”(魏了翁《满江红·和李参政惠生日》)等等。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魏了翁。魏了翁在作词时,将自己熟稔的理学术语不时引入词中,据笔者统计,他词中出现的理学常见范畴如“霁月光风”、“本有”、“天机纯熟”、“格物功夫”等共有近二十处,且有的理学话头被反复运用,如“与自家意思一般”,先后被化用达五处之多<sup>②</sup>。以理语入词,从一定意义上说,超越词体传统观念,丰富了词的话语表达系统,扩大了词体堂庑,这是理学家词人对词体做出的特殊贡献。

以理意融词,是指把理学思想融进词句当中,借词篇阐发理学义理,表达理意。依其艺术成就之高下,以理意融词,可划分为理趣、理致、理障三类。上者义理与词情审美有机融合,表现为理趣;中者稍乏词情诗意,重在传达哲理、义理,表现为理致;下者粗列理语,沦为理障。<sup>③</sup>理学家以整首词表现理趣之作比较少见,大多是词中一些句子、段落富有理趣,如:“万事无心随处好,风定一川澄碧。”(魏了翁《贺新郎·和许侍郎韵》),以“风定一川

<sup>①</sup> 谢桃坊《论魏了翁词》,《天府新论》,1996年第1期,第68页。

<sup>②</sup> 笔者另撰有《论魏了翁词的理学意味》一文,专门探讨魏了翁的以理入词,其中统计罗列了他的以理语入词现象。待刊。

<sup>③</sup> 关于“理趣”、“理致”、“理障”三层次的划分,可参看陈文忠《论理趣》,《文艺研究》1992年第3期。拙著《理禅融会与宋诗研究》亦将宋代理趣诗划分为此三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可参读。

澄碧”形象阐释万事无心之妙境：“鱼鸟自飞自跃。红紫谁开谁落。天运渺无声。四序镇如此，当复亭亭。”（魏了翁《水调歌头·上巳和黄成之韵》），以鱼鸟花草之自在，说明天运之行无时无处不在等。这些词句，“以山水通于理道”<sup>①</sup>，将抽象的哲理借助于形象来表达，获得艺术性与哲理性的双美。

理学家的以理意融词较多地表现为理致层面，即借助词体形式和一定的文学性来阐说义理，表达理性思索。如汪莘的《水调歌头》：

欲觅存心法，当自尽心求。此心尽处，豁地知性与天侔。行尽武陵溪路，忽见桃源洞口，渔子舍渔舟。输与逃秦侣，绝境几春秋。举全体，既尽得，要敛收。勿忘勿助之际，玄牝一丝头。君看天高地下，中有鸢飞鱼跃，妙用正周流。可与知者道，莫语俗人休。（《水调歌头·客有言存心者，未得其序，因赋》）

这首词讲理学的“存心”法，阐明应从“尽心”求“存心”。上阕化用陶渊明《桃花源记》故事，下阕的“鸢飞鱼跃”虽是理学话头，却形象鲜明，词篇因此具有一定的文学性。

以词表现理意之拙劣者，就沦为理障。如沈瀛的《醉落魄》词：

致知格物。孔颜学问从兹出。圣言句句皆真实。涵养功深，将见自家得。毋意毋我毋固必。视听言动非礼勿。胜己之私之谓克。克尽私心，天理甚明月。（《醉落魄·致知格物》）

词篇讲理学的“格物致知”，全然是理学术语和枯燥乏味的议论文字，几无诗性审美，陷入理障。所幸的是，理学家词中像这样的作品并不是很多，毕竟，理学家的文学素养普遍较高，对于文艺小词，他们是非不能也，乃不为耳。

以理法构词者如汪莘的《水调歌头·听说古时月》：

东坡云：“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本于太白问月云“青天有月来几时”。太白云“今人不见古时月”，本于抱朴子云“今月不及古月之朗”。抱朴子所言，非绮语也。深思而得之，诚有此理。嘉定元年中秋日，因赋水调，其夜无月。

听说古时月，皎洁胜今时。今人但见今月，也道似琉璃。君看少年眸子，那比婴儿神采，投老又堪悲。明月不再盛，玉斧亦何为。约东坡，招太白，试寻思。凭谁斫却，里面桂影数千枝。忆在无怀天上，仍向有虞宫殿，看月到陈隋。别有一轮月，万古没成亏。

这首词完全按照理性的思维方式来构思。中秋明月，在文人士子的笔下，总是和人世间的离散团聚相联系，从而引发“此事古难全”的喟叹。此词一反众人熟知既定的文学思维模式，表达作者因月而引发的思考。在词序里，作者对东坡中秋词句探根溯源，深思寻绎，词篇就是他理性思考的结果。词上阕化用《抱朴子》语，由古时月推想到今时月，以人的眸子在婴儿、少年、投老时期的不同，感叹明月不再，青春易逝。下阕承上阕末句，继续思考玉斧斫月的传说，又由自然界的月的恒久，联想到“别有一轮月”，即天理的万古永恒。词通篇体现着作者有关月的哲理性思考，仿佛一篇辨月的哲理文，印证了作者的理学家身份特征。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自晚唐五代以来，言情说爱几乎是词之专属，其所擅者乃婉转缠绵，幽怨深邃情感之表达，而理学以哲理思辨的精邃周密为基本特征，理学家们的词却将二者力图结合起来，或者说，用词的形式来阐说理学思想，把词也看作押韵之语录。这一方面拓展了词体的表现领域，另一方面也消解着词的抒情特质。更有些理学家的词作，是把理学义理嫁接到词体上，使词因此生硬扞格，造成对词体特质的损伤，或亦成为理学家的高头讲章。这种弊端，连理学家自己也意识到了。南宋吴泳曾批评魏了翁的词说：“如侍郎（指魏了翁）歌词内，‘重卦三三’、‘后天八八’、‘三三律管’、‘九九玄经’等语，觉得竟非词人之体。是虽胸次义理之富，浇灌于舌本，滂沛于笔端，不自知然而不然，但恐或者见之，乃谓侍郎尽以《易》元之妙，谱入歌曲，是则可惧也。”<sup>②</sup>吴泳以文学形式各自有体为立论依据，

<sup>①</sup> 钱钟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39页。

<sup>②</sup> 《与魏鹤山书》，《鹤林集》卷28，四库全书本。

批评魏了翁的部分词篇“非词人之体”，即是对理学家以理入词而未能把握好“度”的一个中肯意见。但或许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最佳的解决方案，毕竟，词情审美与理学义理是两种不同的思维走向。

理学家词的另一类是词人面貌的词篇，这些词作虽出自理学家之手，却具显著的文人色彩。如吕本中的词：

巧语娇莺春未暮，杨柳风流，恰过池塘雨。芳草满庭花满树，无情蝴蝶飞来去。睡起小奁香一缕，玉篆回纹，等个人分付。桃叶不言人不语，眉间一点君知否。（《蝶恋花·春词》）

词写一个女子的寂寞春情，意象丰赡，含蓄蕴藉，委婉多情，颇具婉约风致。曾季狸尝评吕本中词云：“东莱晚年长短句尤浑然天成，不减唐《花间》之作。”<sup>①</sup>指出吕本中词的花间风格痕迹。

理学宗师朱熹的词，与他的诗文面貌明显不同，呈现出文人化的特征。如：

临风一笑，问群芳谁是，真香纯白。独立无朋，算只有、姑射山头仙客。绝艳谁怜，真心自保，邈与尘缘隔。天然殊胜，不关风露冰雪。应笑俗李粗桃，无言翻引得，狂蜂轻蝶。争似黄昏闲弄影，清浅一溪霜月。画角吹残，瑶台梦断，直下成休歇。绿阴青子，莫教容易披折。（《念奴娇·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词韵》）

词咏写梅花，直写出梅花幽洁高雅之精神，与林逋的《山园小梅》和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堪称宋代诗词苑囿中咏梅的鼎立之作。

杨万里被全祖望称为“以学人而入诗派者”，<sup>②</sup>亦有理学意味的词篇。他在表现理学思想时，注重哲理意味与词情审美的结合，文人氣息较浓。如下列两词：

月未到诚斋，先到万花川谷。不是诚斋无月，隔一林修竹。如今才是十三夜，月色已如玉。未是秋光奇绝，看十五十六。（《好事近》）

偶听松梢扑鹿。知是沙鸥来宿。稚子莫喧哗。恐惊他。俄顷忽然飞去。飞去不知何处。我已乞归休。报沙鸥。（《昭君怨》）

前首写月，上阕写月光无处不在，含“月印万川”意，体现理学“理一分殊”的思想。后首咏沙鸥，寄托归隐意，富含机趣。两首词既饶理趣，也具有“诚斋体”诗构思巧妙，生新出奇的特征。

真德秀仅存的一首《蝶恋花》词，艺术成就很高：

两岸月桥花半吐。红透肌香，暗把游人误。尽道武陵溪上路。不知迷入江南去。先自冰霜真态度。何事枝头，点点胭脂污。莫是东君嫌淡素。问花花又娇无语。

词咏写红梅，情致细腻婉转，运用比拟的修辞手段及相关典故，想象奇特，笔法幽微，颇具婉约词风致。前人疑惑地感叹说：“作大学衍义人，又有此等词笔。”<sup>③</sup>近人刘毓盘亦谓此作使“朱晦庵不能专美于前矣”<sup>④</sup>。上举词作，虽出自理学家手笔，却具文人词的风格面貌，文人化色彩非常鲜明。

## 二、对“理学词派”说的商榷

宋代理学家的词创作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大概是因为他们具有学术理念上的一致或相似的缘故。那么，是否可以因此说宋代存在一个理学词派呢？在关于宋代理学与宋代文学的关

<sup>①</sup> 曾季狸《艇斋诗话》，中华书局1985年版。

<sup>②</sup> 全祖望《宝鼎集序》，《鲒埼亭集》卷32，《全祖望集汇校集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606页。

<sup>③</sup> 清王弈清等撰《历代词话》卷7，词话丛编本，第1231页。

<sup>④</sup> 《词史》，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96页。

联性研究中,学者们提出了“理学诗派”<sup>①</sup>、“理学文派”<sup>②</sup>、“理学词派”等理学与文学联袂孕生的文学范畴。笔者以为“理学诗派”、“理学文派”的概念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客观存在或可以成立,但是,理学词派的提法是值得商榷的。

讨论理学词派的存在与否,必然会牵扯到一个相关的前提问题,即宋词是否存在流派?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尽管关于宋词流派的著作和论文不断涌现,但学界对于宋词有无流派问题的争论也一直相伴而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两位老学者施蛰存和周楞伽为始作俑者,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关于宋词有无流派的争论<sup>③</sup>,争论的结果不了了之,争论的起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者们对“体”与“派”的概念认知存在歧义,混淆了风格和流派,不在一个统一标准下的争论,其实是自说自话。综括现有学说,笔者以为,宋词的流派说是成立的,这既是对文学史事实的忠实描绘,也是为着文学研究的需要。因此,本文首先坚持宋词存在流派这一立论前提。

理学词派的概念范畴,不见于前代著述,是由当代学者提出来的。就笔者所见,崔海正尝提出“理学词”的概念,认为:“应当给予宋代‘理学词’一定的地位,因为无论如何,它总是宋词艺圃中的一个品种,一枝‘独异’的花朵——尽管它并不名贵。”<sup>④</sup>这里虽然没有明确运用流派概念来区别理学词与其他宋词的不同,实际隐然含有区分派别的意味在里面。谢桃坊曾经以魏了翁为理学词派的代表,认为:“魏了翁在理学家中是词作最多的,而且最能代表这一词派之艺术特色。”<sup>⑤</sup>许总也明确提出:“(宋代)在词学理论上出现了独具特色的理学家词学观,在词的创作上则形成一个有别于宋词主调的理学词派。”<sup>⑥</sup>其《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一书第六章更径直以“理学词派”标目<sup>⑦</sup>。但是,宋代是否存在一个理学词派呢?

根据文艺学理论,刘扬忠在研究唐宋词流派时,就文学流派的形成提出如下条件:

一、必须有一位创作成就卓特、足为他人典范且个人具有较大凝聚力与号召力的领袖人物作为宗主;

二、在这位领袖人物周围或在他身后曾经聚集过一个由若干创作实践十分活跃并各自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追随者组成的作家群;

三、这个作家群的成员们尽管各有自己的创作个性和艺术风采,但从群体形态上看却有着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和相近的艺术风格。<sup>⑧</sup>

如果按照以上三个标准来衡量,则可以认为,宋代并不存在所谓“理学词派”。

这里首先涉及到对理学词人的范围界定。就笔者目力所及,学界有限的对宋词与理学关系的讨论文章中,理学词人的范围都比较宽泛,诸如司马光、吕本中、杨万里、陈亮等都归入其中。笔者以为并不十分妥当。史学界关于“理学”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理学,泛指两宋时期内各种以儒家学说为主的哲学思潮,包括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苏轼蜀学、

<sup>①</sup> 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列有“邵康节体”,标举邵雍诗风为一体,最早为理学家诗张目。宋末方回、元初袁桷、近世陈延杰论宋诗派别,隐然已将理学诗作为一个派别看待,至梁昆《宋诗派别论》,确切提出“理学诗派”的范畴。以后,谢桃坊撰文《略论宋代理学诗派》(《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祝尚书亦有《论“击壤派”》,《文学遗产》2001年第2期),对这一诗派展开研究。

<sup>②</sup> 郑振铎将南宋散文分出道学一派,以朱熹、吕祖谦、真德秀、魏了翁为代表,见氏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四章,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于南宋后期散文列有道学派,以朱熹为典范,真德秀、魏了翁和林希逸等为代表作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493页。杨庆存认为南宋以朱熹、吕祖谦和张栻为核心而逐渐形成了一个散文流派——理学派,又认为南宋中后期散文领域又有一道学辞章派,以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等为主要代表。见其《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186页。

<sup>③</sup> 见施蛰存、周楞伽《词的“派”与“体”之争》,《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关于词的“派”与“体”之再争议》,《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sup>④</sup> 崔海正《宋词与宋代理学》,《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sup>⑤</sup> 谢桃坊《论魏了翁词》,《天府新论》,1996年第1期,第68页。

<sup>⑥</sup> 许总《论宋代理学家词学观及其创作特点》,《西北师大学报》1999年第6期。

<sup>⑦</sup> 许总《宋明理学与中国文学》,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sup>⑧</sup> 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页。

程朱洛学、张载关学、陆九渊心学、叶适事功学、张栻湖湘学等等。狭义的理学，特指程朱洛学一脉。如果按照广义的理学概念界定理学家词人范围，则苏轼、王安石、司马光、陈亮、刘克庄等人都应归入理学家词人之列，然而笔者以为这种界定恰因其过于宽泛而失却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比如苏轼，在哲学学派方面，他是蜀学的代表人物，但他的词创作却是典型的文人词，开创了宋词豪放的新风格，囿之为理学词人则显得滑稽。陈亮是事功学派的中坚力量，他的词创作呈现豪放风格，是辛派词人的主要作家，似也不宜以理学词人目之。故结合史学界、哲学界的研究惯例，本文对理学词人范围的界定，也以狭义的理学概念为主，主要指程朱洛学一派的理学家，兼及吕本中、杨万里等既是理学家又是文学家的双重身份比较突出的个别文人。

考察宋代理学家的词创作情形，我们发现，宋代理学词人中没有一位堪称“理学词派”领袖的宗主式人物。朱熹是宋代理学家中最有影响力和感召力的，但其词作数量很少，仅有20首（一说为17首半），且这20首词作风格面貌多样，其中回文词2首，虽然娴熟精巧，却不过是作者逞弄文字技巧的产物；《浣溪沙·压架年来》、《好事近·春色欲来时》、《南乡子·落日楼船》及两首《忆秦娥》主要写景，通俗明快；《西江月》两首、《鹧鸪天》三首为抒怀之作，洒脱流利；《青玉案·雪消春水》写景兼抒怀，感慨深沉；《念奴娇·临风一笑》为咏梅词，飘逸绝尘，置于词人集中，亦堪称佳作；《满江红·秀野诗翁》为寿词，乃平平之作；5首《水调歌头》（其中一首为隳括体）写景抒怀，俱清旷超迈，卓尔不群。整体观之，朱熹词艺术成就较高，但词作数量很少，且没有形成自身独具的主流风格，因此很难为他人典范。元代刘因有一首《水调歌头》，词题注明为“仿晦翁体”，但这仅是刘因对朱熹同调词风格的模仿，并不能涵盖朱熹词的全貌，且笔者检索电子版《四库全书》，标明仿效朱熹词风格的作品仅此一首，更可知所谓“晦翁体”，仅是刘因的一家之言。

魏了翁在理学家中存词最多，共189首，但作词乃其余事，且以制作交际应酬的祝寿之词为主，重实用之效，而乏词创作的垂范之功。他与当时文学人士也很少交往，不足以成为词坛开创流派的宗主式人物。

其次，宋代不存在理学词人群。宋代理学家有词作传世者很少，不足以形成一个群体。笔者对唐圭璋《全宋词》和孔凡礼《全宋词补辑》进行检索发现，与诗文比较起来，宋代理学家染指词创作的人数少，词作数量也少。北宋理学家几乎没有词作传世。南宋理学家中，朱熹的周围，惟朱松、刘子翥、张栻、王彭年等涉笔词创作，但刘子翥存词4首，其余三人均只有1首词作。魏了翁周围，叶适、刘光祖、李从周、李壁、虞刚简、真德秀、吴渊、牟子才、王柏、家铉翁词作数量都很少，一般仅有一、二首，最多的刘光祖不过存词11首。可见，这些理学家们不过偶尔涉笔词作，不足称其为词人。

再次，宋代有词作传世的理学家，其创作没有形成较为一致的审美倾向和相近的艺术风格。与朱熹有交的理学家中，陈亮作词较多，但其风格更近词人之词，通常将之归入辛派词人的行列里。与魏了翁有交的理学家中，汪莘、洪咨夔、吴泳、吴潜等作词较多，但风格各异，汪莘词闲散超脱，不拘音律<sup>①</sup>，有出尘气；洪咨夔词疏朗明快，有豪壮气；吴泳词骏爽流利；吴潜存词250余首，面貌丰富，风格多样，乃词人之词。因此，宋代理学家作词，可谓各自为战，几无承传。理学家们词风各异的现象，与他们的词学观念和词创作的态度有关。在词学观念上，他们于词的表现内容主张雅正醇厚，对词体艺术倒也欣赏，但视词为小道末技，创作上率意为之，很少精心刻琢，因此，或者数量很少，或者较少轨范，多方尝试，面貌多样化。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理学家们的词创作比较有限，艺术成就普遍不高，关于词体的理论阐述也很单薄。这足以说明，与诗文比较起来，理学家与词的关系显得疏远，词体受到

<sup>①</sup> 清沈雄《古今词话·词评上卷》：“汪（莘）字叔耕，长短句似坡翁，不受音律束缚者。”词话丛编本，第1012页。



来自理学的冲击最为薄弱。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恐怕在于理学家对词体本能的戒心和防备,因为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与以表现“人欲”为创作主调的词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理学与词的不可融合性即在于此。比如,在苏轼已经大量制作词篇时,与他同时的程颐竟然还因为弟子赴会听歌曲而“闻之大不乐,以为如此绝人理,去禽兽无几尔”。<sup>①</sup>宋代理学家在重道轻文的思想指导下,对文学艺术一贯抱着抑制的态度,正如刘克庄所总结的:“为洛学者皆崇性理而抑艺文,词尤艺文之下也。”<sup>②</sup>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宋代理学家与词的关系自然就疏远得多。

谢桃坊说:“宋词中真正的别调与变体应是理学家之词,它是自理学营垒侵入词坛的异军,尤其是它带着对词体敌视的心理和载道的观念,似乎在威胁着词的体性。”<sup>③</sup>笔者以为,说理学家词是“别调”、“变体”、“异军”犹可,但谓其“带着对词体敌视的心理”则可商榷。实际上,程颐对秦观的批评,在于他“上侮苍穹”的内容对天的大不敬,<sup>④</sup>而非词体本身,相反,他对晏殊词句的“鬼语”的评价,<sup>⑤</sup>逗露出他也欣赏晏殊词精妙的艺术技巧,因其是“笑曰”,而非“斥曰”或“怒曰”。朱熹关于词之来源的“泛声”说<sup>⑥</sup>,也说明他对词体形式的认可,在积极为词体和传统文学形式找联系,以为其验明正身。接受其形式,拒斥其内容,在理学家的半推半就中,词和理学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调和交融。谈说理学义理是理学家本色,当其染指小词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理学积淀和素养带入词体,培植出宋词苑囿中一类独特的花朵——烙有理学印痕的词——我们姑且称之为理学词,丰富了词体的百花园。

### 三、理学对宋代词论及宋词创作的影响

理学和词的关系,不仅体现为理学家们对词创作的染指,更有理学对宋词的深层次影响。在词学观念上,理学的浸染,使得文人学者对词的品评,出现道学气;<sup>⑦</sup>在词的创作上,则扩大了表现畛域,增强了哲理化色彩,促进了词的雅化。

理学家对于词体艺术形式本身并不排斥,但对于词中的旖旎缠绵,尤其是关于男女之情的表现,他们是坚决摈弃的,因为男女情爱正是理学所压抑扼制的“人欲”的最直接体现。理学家们用理学思想作为评价体系衡量词作,要求词应当同传统诗文一样,表现“性情之正”。欧阳修乃一代文宗,亦以理学的尺度,谓其“不见道”。<sup>⑧</sup>朱熹批评黄庭坚“艳词小诗,先已定以悦人,忠信孝弟之言不入矣”<sup>⑨</sup>,推赏张孝祥父子的诗词“使人奋然有擒灭仇虎、扫清中原之意”<sup>⑩</sup>。诸种言论,或正面称颂,或反面驳斥,都指出词应当表现忠信孝悌等道学的、正统的观念,能够使人们积极向上。这说明,在词体日益成为士大夫文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娱乐工具和抒情手段后,理学家们不可能完全回避它的存在和影响,忸忸怩怩地接

<sup>①</sup> 吕本中《童蒙训》卷下。

<sup>②</sup> 《黄孝迈长短句跋》,《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卷106。

<sup>③</sup> 《论魏了翁词》,《天府新论》1996年第1期。

<sup>④</sup> 据《河南程氏外书》卷12记载,程颐一日见秦少游,问:“‘天若知也和天瘦’,是公词否?少游意伊川称赞之,拱手逊谢。伊川云:‘上穹尊严,安得易而侮之?’少游面色驛然。”(《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第442页。)亦见袁文《瓮牖闲评》卷5,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8,文字略异。

<sup>⑤</sup>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19云:“伊川闻诵晏叔原‘梦魂惯得无拘检,又踏杨花过谢桥’长短句,笑曰:‘鬼语也。’意亦赏之。”按,此亦见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8,陈鹄以此语为贬,恐误。

<sup>⑥</sup> 《朱子语类》卷140云:“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33页)

<sup>⑦</sup> 关于理学与宋代词学观念的关系,段学俭撰文《理学家与宋代词论》(《孔孟月刊》1999年,第37卷第6期),专门探讨宋代理学家与词学的关系,论述甚详,可参看。本文所关注的则是理学思想对于宋代文人词学观念的影响。

<sup>⑧</sup> 林希夷《竹溪先生十一稿续集》卷28记载:“和靖曰:‘欧公文章一时宗师,只为不见道,故有憾。’”(四库全书本)揣度其意,当主要是针对欧阳修词的批评。

<sup>⑨</sup> 《朱子语类》卷130,1986年版,第3120页。

<sup>⑩</sup> 《书张伯和诗词后》,《朱文公文集》卷84。

受了它，但仍然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对词进行改造，即把词视为同传统诗文一样可以载道的工具。这种努力，实际上对词起到了“尊体”作用，与苏轼、辛弃疾等人从文学的立场出发，通过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的手段提升词体地位殊途而同归。理学思想还影响到当时文人对词的批评标准。如苏门弟子之一的张耒，虽然不是理学家，但他与黄庭坚一样，其思想非常接近理学<sup>①</sup>，他评价贺铸的词说：“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余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是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泽之工，则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sup>②</sup>对贺铸词的赞赏回护，活脱一副理学家的口吻。南宋王灼谓苏轼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sup>③</sup>，亦强调苏词内容的雅正清刚及其对人精神面貌的提升作用。这些言论表明，理学作为一种日渐盛行的主流社会思潮，对于宋代文人思想观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使得宋代（尤其是南宋）的词学理论带上了鲜明的理学色彩的印痕。

理学对词创作的影响在于，以理入词，拓展了词的表现内容，丰富了词的思想内涵，强化了词的哲理色彩。宋词中有一些具有哲理意味的词篇，其创作主体既有理学家，也有文士词客，不同的是，理学家词人主要表现理学义理，文士词客则表达包括佛禅理道、客观规律及人生法则在内的宽泛的哲理。理学家们所作的理学意味的词篇已见前述，文士词客之作，往往能把哲理意味同景物描绘、感情抒写有机地结合起来，创作出情、景、理交融的优秀哲理词。如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形象鲜明，理趣深蕴。陆游《卜算子·咏梅》，在咏物中寄寓高洁情操与坚贞品格，梅的形象风神卓绝，词意深厚。这些词篇，把深刻的哲理意蕴融入生动的词情审美，使两者有机融会，富有理趣，与理学家的以理入词，有着艺术与实用、求美与求真的创作主旨的根本区别，其艺术成就自然有工拙高下之异。

理学还促进了宋词的雅化。关于这一点，崔海正撰文有所阐发<sup>④</sup>，本文不再赘述。这里只想补充说明，即理学对于词体的雅化，不是直接发生作用，而是理学思潮浸润到词人的词学观念中，进而对其词创作产生间接影响，姜夔、吴文英复雅词派的出现，恐与理学有一定关系，鉴于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只能留待以后探讨了。

#### 四、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 1，宋代理学家的词创作呈现出两种面貌，一类是具有理学意味的词，另一类是文人化的词，两者合构成理学家词的全貌。
- 2，宋代理学家的词创作虽然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但按照文学流派形成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来衡量，宋代并不存在理学词派。
- 3，理学和词的关系，不仅体现为理学家们对词创作的染指，更有理学对宋词的深层次影响。在词学观念上，理学的浸染，使得文人学者对词的品评，出现道学气；在词的创作上，则扩大了表现畛域，增强了哲理化色彩，促进了词的雅化。

<sup>①</sup> 黄宗羲《宋元学案》中因此收有张耒并为之作传，见《宋元学案》卷99“苏氏蜀学略”。

<sup>②</sup> 《贺方回乐府序》，《张耒集》卷48。

<sup>③</sup> 《碧鸡漫志》卷2，词话丛编本，第85页。

<sup>④</sup> 崔海正《宋词与宋代理学》，《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